

目 录 CONTENTS

本期专题·绿色化

- 01 政治局会议首提“绿色化”，“新四化”全面升级“新五化”
- 04 “新五化”替代“新四化”为社会进步点赞
- 05 准确把握“绿色化”的科学涵义
- 09 外媒：中国汽车逐渐绿色化并不能拯救环境

国是论衡

- 10 谈环保需要一点想象力

高层声音

- 12 王岐山回应是否特赦贪官 称“还不到时候”

政坛经纬

- 15 “超配”干部如何消化

八面来风

- 17 李光耀立遗嘱将其故居拆除 子女表示执行

历史深处

- 18 政治漩涡中的写作班子（三）

悦读时光

- 封三 今天我们如何谈政治

编者按：2015 年 3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在重申十八大关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的同时，首次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战略任务。这是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之后，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的又一重大决策。

其中的“绿色化”作为在中共中央的历史文献中首次出现的新概念，集中体现了新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备受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准确把握“绿色化”的科学涵义也相应成为社会各界共同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绿色化”究竟是什么？

首先，在经济领域，它是一种生产方式——“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有着“经济绿色化”的内涵，而且希望带动“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

同时，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

并且，它还是一种价值取向——“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

简单来说，就是把生态文明摆到了非常高的位置，不仅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发展方式的“绿色化”，而且要使之成为高级别价值取向。其阶段性目标，就是通稿里提到的，“推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加快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利用、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也就是朝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进发。

如何实现绿色化？专家们在专题文章中提出了很好的意见。“绿色化”需要全社会通力合作。“新五化”替代“新四化”，不仅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更重要的还是全社会每一位公民的自觉自愿作为，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为实现“绿色化”全力以赴，让“绿色化”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追求”，让人们生活在绿色阳光、闪亮的日子里。

本期专题推出“绿色化”，供您决策时参考。其他栏目的文章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 6 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政治局会议首提“绿色化”， “新四化”全面升级“新五化”

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有一个概念让人耳目一新：“绿色化”。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个概念是首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而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这是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概念的升级——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之外，又加入了“绿色化”，并且将其定性为“政治任务”。换句话说，这是“四化”变“五化”。

那么，“绿色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内涵和外延是什么？习近平为何如此看重这个概念，它又将如何影响中国的走势？

1 “绿色化”究竟是什么

首先，在经济领域，它是一种生产方式——“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有着“经济绿色化”的内涵，而且希望带动“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

同时，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

并且，它还是一种价值取向——“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

简单来说，就是把生态文明摆到了非常高的位置，不仅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发展方式的“绿色化”，而且要使之成为高级别价值取向。其阶段性目标，就是通稿里提到的，“推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加快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利用、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也就是朝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进发。



采用高温高压燃秸秆锅炉和抽凝式汽轮发电机组装机发电供暖，年消耗替代煤炭等燃料的稻壳、秸秆和林下剩余物约30万吨，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5万吨。

新华社 资料

事实上，“绿色化”这个词并非一个凭空造出的概念。早在1949年，《人民日报》就有一篇关于介绍苏联“绿色化”的文章，在那里，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指“植树造林、绿化”；进入90年代以后，这个词则开始被用在食品、生态农业等领域，表示有机、无公害等概念；再后来，这个词开始被用在建筑、化工、制造业、工程管理等领域，环保、生态友好的理念开始融入这些领域。

但前面已经说到，将绿色化提得这么高，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将其与“新型四化”并列，则更是属于理论的又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开始有了理论上的“抓手”，也有了实践的路径。

数字可以表现情况的紧迫程度：在全国74个按新的空气质量标准监测的城市中，达标比例仅为4.1%；全国1.5亿亩耕地受污染、四成多耕地退化，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近三分之一；森林生态系

统退化严重,土地沙化、石漠化仍然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严重污染的劣Ⅴ类水体比例达10%左右。

如习近平所言,“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2 从福建到浙江的习近平

就习近平本人来说,对生态文明的关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数十年来的“久久为功”。

举了例子就知道。通稿中有一句话:“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看上去非常眼熟是不是?

是的,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演讲的习近平,就说过“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这句话,其实在他2006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说过,并有一段“两座山”的关系论述:

“在实践中对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和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阶段是一种更高的境界。”

如果你更加熟悉习近平,或许会想起去年他到福建考察时,《福建日报》的那个头版报道的标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同志关心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纪实》。

长汀,客家人聚居地,200年来饱受水土流失之苦。1999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习近平到当地调研,之后十年,长汀的水土流失都被列入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调任浙江之后,他收到了当地居民寄去的樱桃——昔日170万亩水土流失的贫

瘠土地,变成了瓜果飘香的“花果山”,这事儿还上了新闻联播。

时光再往前推10年,1989年,年轻的习近平写过一篇《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收入《摆脱贫困》中。文中,他举例道:

“例如,修了一道堤,人行车通问题解决了,但水的回流没有了,生态平衡破坏了;大量使用地热水,疗疾洗浴问题解决了,群众很高兴,但地面建筑下沉了,带来了更为棘手的后果;这类傻事千千万万不得!”

另一个数据是,从1979年起,连续36年,福建的森林覆盖率排名全国第一;2014年3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支持福建省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3 总书记习近平为何关心生态

刚结束不久的2015年两会,在上海团、江西团,在广西团、吉林团,习近平每次都谈到生态环境问题。在江西,除了引用“落霞与孤鹜齐飞”之外,他还对江西的人大代表们说:“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去年两会也有类似的场景。那一次是在贵州团,他开玩笑说,贵州的生态很好,甚至可以开发“空气罐头”。

而今年年初在云南,他的一句“立此存照”也使人印象深刻——“过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让“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

事实上,担任总书记之后,无论是在国内主持会议、考察调研,还是在国外访问、出席国际会议活动,生态文明、生态安全都是他的重要议题。新华社通讯的数字显示,与此相关话题的重要讲话、论述、批示已经超过60次。

201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六次集体学习,专题就是生态文明。而在那次会议上,习近平的许多提法,比如“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甚至是环保方面的

“新五化”替代“新四化”为社会进步点赞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绿色愿景，将在法治化、制度化的轨道上渐次展开。（人民网）

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词语“绿色化”，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将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何为“绿色化”？“绿色化”，它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价值取向。“绿色化”提倡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有着“经

济绿色化”的内涵，鼓励绿色产业的发展；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

习总书记曾经说过：“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由此可见，生态环境对于一国发展，乃至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因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人们生活质量，以及生命健康的优劣。十八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理念，“生态文明”首次提到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并列的地位。笔者认为，此次政治局会议，将

“责任追究制”，都在此次中央政治局的通稿当中显示出来。

其实，“绿色化”能提到“五化”的地位，也是一种理论必然——在十八大上，“生态文明”就被首次提到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并列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了全新的“五位一体”；那次会议上，“美丽中国”的目标也首次被提出，并提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

而十八大报告的起草组组长，正是习近平。

学习小组（微信号：xuexixiaozu）一直说，“这些年，与习近平一起进步，共同担当”。我们看到，十八大以来，中共的理论创新一直在进行，无论是“四个全面”，还是“五化”，均属此列。

新的说法，总是新的实践下的理论提炼。

比如，相对于2年前的政治局集体学习，此次政治局会议，习近平的提法已经显然更加全面。昨天的会议中，“绿色化”不仅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内

容，还有上升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将改革作为绿色化的切口方案，而且提出了法治和制度保障；不仅有国内视角，还有国际视野，寻求国际合作。

更加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地方在于，在十八大提到“五个文明”之一之后，“生态文明”终于有了落实方案和路径。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总体目标，而“绿色化”则是具体道路；中国特色的总体道路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其中都要“贯穿生态文明”。

也就是说，生态将不仅仅是环保部、国土部、甚至是林业局、海洋局的“片内”工作，而将是“全国一盘棋”；不仅是“政绩”，而且将是真金白银的巨大产业；不仅是“肉食者谋之”，而是“匹夫有责”。

“希望北京乃至全中国都能够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让孩子们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这也是中国梦很重要的内容。”2014年11月，在APEC带来的蓝天之下，习近平如此说道。



准确把握“绿色化”的科学涵义

一

准确把握“绿色化”的科学涵义，首先必须对“绿色化”的字面含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绿色化”是由“绿色”和作为后缀的“化”组成的一个复合词。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等权威辞书的解释，“绿色”既可以用作表示事物名称的名词，也可以用作表示事物属性的形容词。当它用作名词时，指的是一种颜色，即“绿的颜色”，譬如“绿色是橄榄树的颜色”、“大地的基色是绿色”等，其中的“绿色”指的就是一种颜色；当它用作形容词时，指的是事物的一种属性，即“绿色的”，亦即“具有‘绿色’属性的”，譬如“绿色植物”、

“绿军装”、“绿灯”等，其中的“绿色”和“绿”指的就是一种属性。作为后缀的“化”，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反映的是事物变化的动态过程，表示由一种属性转变到另一种属性，譬如“绿化”、“美化”、“恶化”等。此外，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还对“化”做过一个著名的解释，即：“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那是表示彻底通透之意，反映的是事物变化的动态过程的完成，表示由一种属性到另一种属性的转变覆盖该事物变化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由此可以看出，“绿色化”的字面含义大致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新五化”替代“新四化”，把“绿色化”放在了价值取向的较高位置，是社会的极大进步，值得称赞。

“绿色化”是一种美好“希冀”。“绿色化”包含着人们对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的美好向往，以及对四处喧嚣、雾霾肆虐日子的极度厌烦。绿色代表着生机与活力，绿色化象征着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更是一种低调的奢华。“绿色化”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应有之义，更是子孙后代绵延不绝的必然要求。

“绿色化”是一个明确“标杆”。“绿色化”不仅仅代表着希望，更是明确而有力的要求和标准，是衡量社会是否可持续发展的“硬杠杠”。经济发

面应提倡生产方式绿色化，将绿色产业列为经济社会

会发展新的增长点。生活方面更要推动生活方式的绿色化，提倡文明消费、合理消费，将勤俭节约作为自己的准则。“绿色化”这一绿色目标建设的好坏，最重要的还是体现在人们的思想层面。这就要求全社会、全人类树立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较高价值取向，高姿态、高立场、高站位，将“绿色化”从美好愿景变成现实。

“绿色化”需要全社会通力合作。“新五化”替代“新四化”，不仅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更重要的还是全社会每一位公民的自觉自愿作为，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为实现“绿色化”全力以赴，让“绿色化”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追求”，让人们生活在绿色阳光、闪亮的日子里。

（人民论坛网 袁 媛）

一是当“绿色”用作名词时，“绿色化”指的是由无绿色转变为有绿色，由较少或较小范围的绿色转变为较多或较大范围的绿色，由部分或局部的绿色转变为全部或全局的绿色，如此等等。

二是当“绿色”用作形容词时，“绿色化”所指的是由不具有“绿色的”属性转变为具有“绿色的”属性，由具有较弱或较浅的“绿色的”属性转变为具有较强或较深的“绿色的”属性，由部分或局部具有“绿色的”属性转变为全部或全局具有“绿色的”属性，如此等等。

总之，“绿色化”的字面含义都是“绿色”这种颜色和“绿色的”这种属性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浅到深、由部分到全部、由局部到全局等由此及彼的动态转变过程。

在日常用语中，人们对作为后缀的“化”的应用并不陌生，对其所具有的内在涵义在理解上也较为一致，譬如：“新型工业化”指的是由传统工业到新型工业转变，“农业现代化”指的是由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转变，“科学化”指的是由不科学到科学转变，“民主化”指的是由不民主到民主转变，“标准化”指的是由没有统一标准到有统一标准转变，如此等等。

在将“化”字作为后缀的具体应用上，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由不带着中国的特性到带着中国的特性转变，由在其个别表现或部分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到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转变。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后来成为经典表述的“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命题，在其内在涵义上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赋予“绿色”和“绿

色化”的涵义并不限于上述字面含义，而常常在其象征意义上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而这正是准确把握“绿色化”科学涵义的关键所在。

二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从象征意义上又赋予“绿色”和“绿色化”哪些不同的涵义呢？

笔者的初步研究表明，目前人们从象征意义上赋予“绿色”和“绿色化”的涵义至少有以下三种：

一是将“绿色”用作名词，象征以绿色为基色的树木、森林，与此象征意义连在一起的“绿色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绿化”，指的是通过植树造林使一些地方由没有树木、森林转变到有树木、森林，或者由有较少的、质量较差的树木、森林转变到有较多的、质量较好的树木、森林，进而使一切可能的地方都逐步绿起来。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沿用至今的“绿化”即“绿色化”的涵义。如：毛泽东1956年3月向全国人民发出的“绿化祖国”的号召；毛泽东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中指出的“要使我们祖国的山河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毛泽东1966年指出的“一切能够植树造林的地方都要努力植树造林，逐步绿化我们的国家，美化我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习近平2013年4月2日、2014年4月4日、2015年4月3日先后在首都参加义务植树时所说的“全民义务植树开展30多年来，促进了我国森林资源恢复发展，增强了全民爱绿植绿护绿意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总体上还是一个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的国家，植树造林，改善生态，任重而道远”，“中国在植树造林方面为人类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相比，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盼相比，生态欠债依然很大，环境问题依然严峻，缺林少绿依然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我们必须强化绿色意识，加强生态恢复、生态保护”，“绿化祖国，改善生态，人人有责”。其中说到的“绿”、“绿色”

和“绿色”（“绿色化”）所表达的，就是这种涵义。

二是将“绿色”用作形容词，象征事物所具有的“符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要求”的属性，与此象征意义连在一起的“绿色化”指的是使事物由原来不符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的要求转变到符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的要求。如：2014年4月10日筑能网一篇题为《依靠科技创新促进建筑绿色化》的文章所说的“绿色建筑是在建筑的全寿命期内，最大限度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建筑绿色化对于节能减排，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建筑的绿色程度既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也关系到广大民众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水平”，“加快建筑绿色化是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之一”；百度网的《百度百科》在诠释“绿色化学”的涵义时所说的“绿色化学用化学的技术、原理和方法去消除对人体健康、安全和生态环境有毒有害的化学品，因此也称环境友好化学或洁净化学”，“绿色化学的最大特点是在始端就采用预防污染的科学手段，因而过程和终端均为零排放或零污染”，“实际上，绿色化学不是一门全新的科学”，而是“化学的绿色化”，“世界上很多国家已把‘化学的绿色化’作为新世纪化学进展的主要方向之一”。这两篇文章中说到的“绿色”和“绿色化”所表达的，就是这种涵义。

三是将“绿色”用作形容词，象征事物所具有的“符合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属性，与此象征意义连在一起的“绿色化”就是使事物由原来不符合生态文明的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转变到符合生态文明的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这是迄今为止从象征意义上使用的“绿色”和“绿色化”最广泛、最深刻的一种涵义。如：上述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强调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

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作为基本方针，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把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作为基本动力，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把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作为工作方式，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抓紧抓好”。这段话中的“绿色”和“绿色化”所表达的，就是这种最广泛、最深刻的涵义。



◆“绿色化”将贯穿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三

准确把握“绿色化”的科学涵义，除了懂得“绿色”和“绿色化”的字面含义与象征意义之外，还必须懂得“绿色化”的适用范围。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绿色化”作为必须协同推进的“新五化”（即“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之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绿色转型的最新概括，其适用范围除了生态文明建设外，还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自然也包括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

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当然,“绿色化”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笔者看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绿色化”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国民理念的绿色化。要在全社会彻底破除“人类是自然的主宰,要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彻底破除将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观念,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彻底破除自然界没有价值、自然资源不是财富的观念,牢固树立自然界也有价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彻底破除人与自然的工业文明的主流价值观,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

二是国土空间的绿色化。要通过全民义务植树等有效途径,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植树造林,加快推进国土绿化;通过国有林场、国有林区改革和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增强林业发展活力,保护森林资源,提高森林质量;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通过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以东北森林屏障,北方防风固沙屏障等重大森林生态屏障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通过多措并举、多管齐下,使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让人民群众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

三是生产方式的绿色化。要根本改变以“三高一低”(即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和低产出)为特征,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和生态退化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以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为原则的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加快推进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

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加快推进经济要素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安全型绿色产业发展,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加快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生态影响小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

四是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要彻底改变以满足人的无止境的物质欲望为目的,以个人享乐为中心,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大力推行物质消费与精神文化消费并重,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目标,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中心,以合理消费、适度消费为主要特征的生态文明的消费方式;坚决反对无节制消费自然资源、无节制排放废弃物和污染物、无节制破坏生态平衡的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大力推行以节约资源、减少污染、保护生态为准则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使自然资源 and 有毒材料的使用量减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使非法猎杀、买卖、食用和使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五是科学技术的绿色化。要在充分认识科学技术为推动生产力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清醒看到科学技术在目标偏离的情况下给人类带来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负面作用;要努力克服科技发展与应用唯利性和随意性,正确把握科技发展与应用的目标方向,使其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为保护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生态服务;要大力开发绿色生物技术和绿色新能源技术、污染物清除和不产生污染物的技术,以及废弃物再利用技术和无废料生产技术,以实现生物物种的有效保护、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有害有毒物质的净化处理、清洁生产、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和模仿生物圈的物质循环生产,开创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的新的技术形式。

六是制度建设的绿色化。要把制度建设作为推

外媒：

中国汽车逐渐绿色化并不能拯救环境

搜狐汽车 4 月 29 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于日前开幕的北京车展上，来自世界和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们向公众展示了近 100 辆电动汽车以及概念。同时，日益增加的期望表明，替代型技术将很快在中国占领一席之地。

与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相似，中国的政治家和汽车同行高管都开始关注空气污染以及温室气体带来的影响。

但是在这周于北京举行的访谈和会议中，他们则列举了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能源安全。

中国对于进口石油的依赖已经超过了中国石油需求的一半以上，同时其对于燃料的需求预计将继续上升。根据全球顶尖的整车集团 CSM Worldwide 驻 Northville 的预报人员表示，中国汽车产量预计从 2009 年的 1100 万辆增长至今年的 1300 万辆，并且将于 2016 年达到 1900 万辆。所估计的增长值差别很大，但是许多行业内预报人员现在都在预计到 2020 年中国的每年汽车销售量将达到 2000 万辆甚至更多。

如此巨大的数字仿佛正在减弱关于全球变暖以及在已有的和新的动力总成技术之间的成本差异的争论。

比亚迪汽车公司汽车出口贸易事业部总经理 Henry Li 表示，“这已经不仅仅是二氧化碳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能源的安全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电动汽车的原因。”

通用汽车公司，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戴姆勒股份公司和其他全球性的汽车制造商都相继推出了旗下电动汽车，同时日产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 Carlos Ghosn 也表示，该公司可能将于中国生产旗下电动汽车。

戴姆勒和它的中国合作伙伴比亚迪也已经在一起共同制造一款电动汽车，预计这款汽车将于 2013 年开始销售，戴姆勒总裁 Dieter Zetsche 告诉记者，“这也就是我们的未来目标。”

通用汽车公司展出了一款电动版雪佛兰 Volt MPV5 小型跨界概念车，同时大众汽车也宣布了其在 2011 年和 2012 年在中国主要城市做旗下电动版大众 Golf 和 Laida 车型的展示巡游计划。在 2013 年，大众汽车将开始在中国本地生产电动版汽车，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 Martin Winterkorn 表示。

吉利汽车有限公司，一个雄心勃勃的中国本土汽车制造商，刚刚与瑞典品牌沃尔沃汽车公司成功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把绿色化作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本质属性，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着力破解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以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生态补偿等重大制度为突破口，深化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尽快出台相关改革方案，建立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与此同时，还要推动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相关制度建设的绿色化，使之与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的绿色转型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绿色中国》文摘 作者：黎祖交）



谈环保需要一点 想象力

一个叫黄西的中国人，不远万里去美国留学，拿了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却以脱口秀明星的身份走红。他曾被邀请到白宫的记者晚宴上说单口相声，在表演中，他说想要竞选美国总统，在政见方面，他有一个解决失业的好办法，一个人的活俩人干，就像总统和副总统那样。当时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现场，被这个包袱逗得大笑。

最近，某前央视记者制作了一部关于大气污染的纪录片，在互联网上得到了大力传播，新上任的环保部部长看后也表示“值得敬佩”。该片讲个人际遇，讲化石能源的消耗，也提出了些缓解环境压力的解决途径。

相信很多人听说过“克强指数”，它是李克强总理在辽宁任职期间发明的。“克强指数”的指标

配对，吉利公司也展示了旗下多款替代型技术汽车。汽车款型范围包括从较温和的使用铅壳硫酸蓄电池的 EK-1 电动版汽车，其最高速度仅仅达到每小时 50 英里，到更先进的 EK-2 锂离子电池动力汽车，该车同时也是一款可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吉利控股公司的副总裁 Frank Zhao 表示，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高度优先考虑的问题。

Frank Zhao 在上周六的一个行业会议上表示，“在未来，汽车销售量将达到 3000 万辆。这很好，但是它也同时构成了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的挑战和威胁。”

Frank Zhao 同时表示，吉利估计中国电动汽车及混合动力汽车的销售量在 2020 年将会超过 200 万辆汽车。展望未来，汽车制造商预计电动汽车的销售量在 2050 年的中国将会开始超过常规动力汽

车的销售。

江森自控-Saft (Johnson Controls-Saft) 的混合动力电池系统的首席行政长官 Ray Shemanski 在会议中表示，中国已经拥有完善的电池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世界上第四大锂的储备量。另外，他还补充，中国政府最新的五年计划设想了一个发电的更加洁净的形式。目前，中国超过 80% 的发电依赖于煤炭。

咨询公司 Ernst & Young 的全球汽车产业领导者 Michael Hanley 表示，“政府在这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可以通过激励机制在任何时候发挥作用。”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Ernst & Young) 的调查也显示，部分消费者对于尝试新的技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意愿，有 60% 的人声称他们准备购买或者至少会强烈地考虑电动汽车以及可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青桦)

包括三项：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中长期贷款发放量，这个指标体系得到了一些国际机构的认可，“克强指数”的命名由此而来。

以上几点放在一起看似杂乱无章，实则是有内在联系的。

无论是地方大员还是中央政府首脑，关注经济运行情况都是必需的，而关注经济的意思可以等同于期盼经济增长快一点儿。按照“克强指数”，领导们看到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这3项指标快速增长是会高兴的，因为这意味着经济在蓬勃发展。

在这3项指标中，前两项跟能源耗费密切相关，尤其是工业耗电量一项。目前中国的电力供应仍以煤电为主，占到近七成。用电量大，既意味着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也意味着燃煤量增加，污染物排放增加。相应地，环境压力就增大了。

发电并不是耗费煤炭的唯一途径，工业生产中需要烧煤的地方还多的是，比如钢铁厂的高炉。按照纪录片的说法，全世界的钢产量，中国第一，河北第二，唐山第三，美国第四。京津冀地区的能源消费情况可想而知，这一地区的空气质量自然是不会好的。

2014年冬天北京的“APEC蓝”想必大家还记得，“APEC蓝”是怎么来的呢？大量汽车停驶，北京周边大量工厂暂时停产，污染物排放少了，天空马上就变蓝了。这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污染是工业化的伴生物，环境和工业发展正如鱼和熊掌的关系，二者不可得兼。西方国家的所谓治理污染的经验本质上也是如此，他们的环境之所以好起来，主因是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把大部分制造业，尤其是高污染的行业都转移出去了。

鱼和熊掌如何取舍呢？如果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同为考核指标，官员们可以凭意愿在二者间自由选择吗？恐怕很难，蓝天重要，饭碗更重要。

比如，一个年产量1000万吨的钢铁厂，能解决10万人就业。把钢铁厂关停了，就能解决环境问题，可是又关不得，关了太多人的生计会受影

响，产业升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考虑到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现状，就更令人头疼了，最惨淡时，每生产一吨钢的利润都不够买一个茶叶蛋的。

如何破解这样的困局，缓解环境压力，纪录片给出的答案是靠市场的力量推动能源升级和少开车、多打举报电话等“善举”。

我们还不如从黄西的笑话里寻找一点灵感。“一个人的活俩人干”的“政见”首先体现了一种对发展的不同态度。像钢铁行业这样的困顿局面是如何导致的呢？无疑是缺乏长远眼光和规划的产物，各方面都盯着每月每年的经济指标看，只要当下漂亮就好，最终陷入麻烦。这是一种资本的即时积累压力支配下的行为，注定是短视的，它恨不得把“俩人的活一个人干”变成常态。“一个人的活俩人干”则相反，它不服从资本的逻辑，有可能做出长远、适当的规划。

其次，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求，但不能满足人类的贪婪。当今的经济是以无限刺激人的欲望为前提的，这是造成环境压力的最深层原因。黄西式的“政见”可以视为对这种倾向的批判，表达了让生产回归到本质的意图，即为使用价值而生产，而不是为了交换价值而生产。生产回归本质，生产量就是有限的，污染也就有了限度。

再次，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假定今天的劳动生产率是10年前的一倍，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一个劳动者如今只上半天班就可以了。形式上，这不正是“一个人的活俩人干”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经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但人们却越来越累，我们应该追问为什么。

纪录片走红，环保概念股大涨，这清楚地表明，环保已经被纳入了工业化的逻辑。谈环保需要一点想象力，是指脱离资本逻辑的想象力。环境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类向自然的索取与自然承受力之间的均衡，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经济体系是必定要破坏这一均衡的。

（李北方 南风窗 2015-3-13）

王岐山回应是否特赦贪官 称“还不到时候”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 11 日在湖北武汉进行“反腐新常态”主题演讲,他表示 2014 年是反腐“质性变革年”。他透露,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近期对是否有可能特赦腐败官员的提问,表态称“还不到时候”。

高波透露,近期有官员问王岐山,是否有可能对主动自首的腐败官员酌情特赦。要在两年前,王岐山肯定要拍桌子大骂,但这一次,王岐山只是长叹了一口气说,“还不到时候。”

该如何解读王岐山所说的“不到时候”?高波指出,首先特赦必须有底线,香港廉政公署“特赦令”中的提出“三不赦”或可成为范例,即性质恶劣不赦、正在查办不赦、外逃人员一律不赦。日前,中央将缉捕和抓捕潜逃在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升级为“天网行动”,足可见中央对海外追逃追赃的坚定态度。

更重要的是特赦必须等待时机,高波透露,早在 2007 年就启动过特赦机制,但是效果很差,鲜有官员站出来主动承认问题,问题在于惩处力度不够,“说与不说都一样,当然不会去说”。高波表示,只

有等到反腐形成气候,“生态”再造完成后,特赦才有意义。

高波指出,2014 年是反腐的关键年份,在去年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四大老虎”被查处,为反腐格局带来了“质性的变革”。

中国社科院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12 年民众对反腐的信心度不足 60%,而近两年老百姓对反腐信心大幅提升,去年已有八成以上民众表示对反腐有信心,可见已有“人心回暖的苗头”。

◆延伸阅读:

“特赦贪官”换官员财产公示争议

赞同观点

在当下中国,官员腐败是民众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我们动用了死刑来对付腐败问题,但是“奈何朝杀而暮犯”,腐败包袱犹如滚雪球般越来越重。我相信要解决这腐败问题必须依靠制度。

反腐败的主要任务不在于反昨天的腐败,而在于反今天和明天的腐败。具体来说,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官员权力的监控,如建立官员决策过程公开制度;其二是对官员财产的监控,如建立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在当下中国,后者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是预防腐败的一项有效措施。而在中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虽然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绝大部分官员持反对态度——据《瞭望》周刊 2009 年第 11 期报

道,多次为官员财产申报求法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的调查表明,接受调查的官员 97%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因为让官员如实公开申报全部私有财产,包括在其直系亲属名下的财产,以及在海外的财产,后果相当严重。要知道,不少官员的财产中或多或少地包含着非正当收入。因此,要想建立名副其实的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必须给那些“不良资产”解套。

我以为,“缓查贪官”的临时性政策就可以成为“解套”之举。1970 年代中期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腐败透顶的警察部门中,大批警员被捕入狱,许多人惶惶不可终日,部分警察上街游行,冲击廉署总部。为了挽救一项濒临流产的制度,港督麦理浩于 1977 年 11 月 5 日深夜发表紧急特赦令,宣布除非涉及非常严重的罪行或已经展开调查的案件,对警员 1977 年 1 月 1 日前所犯贪污罪行不予追究,从而为一个新制度的生存换取了空间。

借鉴这一经验,相关权威部门可以选择适当时机,宣布对过去的贪污受贿行为实行附带条件的“缓查”——只要在规定之日后不再有新的贪污受贿行为,以往的贪污受贿行为就不再查办;如果有新的贪污受贿行为,则一并查办过去的贪污受贿行为。与此同时,严格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并允许公民在网上查阅。因为已有“缓查”政策,所以在申报时不问财产来源,只要申报,就视为合法财产。

与此同时,我国应对现有反腐败机构进行整合,变分散为合力,成立集中型的“廉政总署”。整合之后,“廉政总署”的首要任务是全面审查官员财产申报是否属实。凡是没有如实申报的财产,就可以直接推定为非法所得,并由此调查其全部财产的来源以及有无违法犯罪行为。没有申报之后的严查,缓查政策就毫无意义,因此这也是一种“宽严相济”。从这个意义上讲,缓查贪官为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解了套,但同时又为某些官员上了套。

对于贪官来说,“缓查”确乎是个圈套,但属于诚信的圈套,因为权威部门会信守“如实申报便不追查”的承诺。不过,这些贪官仍然面临两难的选择。

如实申报吧,大家都知道他有那么多财产,会有什么看法?不如实申报吧,日后被查出来的后果不堪设想,而且过了这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当然,他们可以在申报之前把自己的“多余财产”以实名或匿名的方式捐献给专设的廉政基金。财产公开之后,官员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夹着尾巴做人,因此这“缓查”贪官,没准还可以成为我国社会风尚转变的契机。

在当今世界,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既不是钱财也不是人才,而是制度。在人类社会的群体竞争中,最重要的取胜因素是制度。在人类文明的进化发达中,最有潜能的要素也是制度。在人类文化的交流互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元素还是制度。诚然,美好制度的创建往往需要付出代价,比如创建者眼前的个人利益。但是,恰如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创建者的付出会转化为子孙后代的福祉,百年之后仍会获得民众的感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

反对观点

近日,我注意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何家弘教授发布名为“以赦免贪官换官财公示”的文章,再次提议“特赦”贪官。何家弘教授一直信持“赦免贪官论”,其在文章中认为:“中国腐败面积大,问题官员多,按照目前的查处进度,中国彻底清除腐败存量或严惩所有贪官的说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只能通过赦免从而有效建立官财公示制度以此遏制腐败。”

从一九九九年算起,“特赦”贪腐官员的言论从提出到现在已近十六年了,随着中国腐败问题的愈演愈烈,这种言论从一开始的“荒谬”到逐渐被专家学者审视思索,争议声一直不断,暂且不论“特赦”论的科学与否,这也算是对解决腐败问题的一种有益的路径探索,只是这种探索掩匿着一种深深的悲观和无力。

不管承认与否,何教授的一个基本判断应成为当下的共识:即当下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或许说“无官不贪”有些夸张,但其潜在的数量绝对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数字,这应该成为探讨“特赦”问题的一个基

本前提。如果现在还有哪些官员学者认为腐败还只是小范围的,我只能说其混蛋,这样的言论才是真正的罔顾人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命运。那么,为减少反腐败的阻力,应以“特赦”来解决腐败存量的问题。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着落下来恐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

一、“特赦”贪官没有民意基础

现在官员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我已不须多言,本身官员群体和百姓群体已经对峙得十分厉害,“特赦”贪官无疑会加剧这样的对峙,强行推行势必会引起社会的动荡,这种震荡程度是不可预估的,哪一位领导人也不敢承负这样的风险。

何教授也意识到了领导者对这点的忧虑,但他不无担忧的在文章中写道:“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作用是反腐败,不是证明官员的清廉。中国不能等到所有官员或大多数官员都成为清官那一天才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简言之,何教授认为中国现状陷入一个进退维谷的尴尬境遇:公示,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不公示,只会使得腐败更加严重。为此,何教授还写了几条如何能够有效减轻这种震荡的建议。

恕我直言,虽说现在党也有意识的“特赦”官员,比如原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的“断崖式”降级,但总归来说,其处理结果还是处罚性质,仍旧在百姓心理可接受的范畴之内,可如果公开“特赦”官员,事情的性质就完全变了味。另外,即便官员交出贪腐财产,可是其在心理上已经失去了道德法纪的正义性,这样的官员,是否还能够得到百姓的真心支持?可以预料,此类官员不管是在百姓面前还是在下属面前,今后的工作开展怕是不会那么顺畅。

二、“特赦”贪官将党置于尴尬的境遇

我相信,“特赦”贪官的动机一定是好的,从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何教授等学者做了翔实的数据查证和相关思索,但是,何教授忽略了一点可能很滑稽却又不可脱避的问题。倘若真的“特赦”贪官,这等于党向全国老百姓和全世界承认了自己的“治腐无能”,并且间接否定了党以往几十年的治理成绩,要知晓,党执政合法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源自过去几

十年国家各方面的良好发展态势,而且党执政才区区近七十年,如果仅仅七十年腐败就成为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死结”,必须以“特赦”贪官来建立合理有效的防腐制度,这不禁会使党的权威在民众心中受到严重的质疑。

三、“特赦”贪官的法理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的全会中,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这充分表明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而“特赦”贪官显然面临着法理层面的窘境,“特赦”贪官本身就是建立在没有实证基础上的一个虚空的设想,因此其提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那里是不可能得到实现,且“特赦”贪官与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严重背离,“特赦”贪官等于是法外开恩,如果这样,我国现行法律的尊严将会大打折扣,法律是红线,不管是党还是人民,都必须严格遵守。

四、官财公示相应机制的缺位

官财公示倒不是说贪污立即从此“尘影无踪”,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纵观整个世界,财产公示执行彻底的国家相应腐败要轻弱一些,而那些执行不彻底的国家腐败依然严重,这就牵涉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就算真的途遭种种“波折”顺利“特赦”贪官然后顺利地“抵达”官财公示制度的设立,那么,谁来监督相应执行,谁能够核准官员的公示是准确无误的,谁能够确保“硬制度”到下面会不会变了样?要知晓,一个充斥着虚假氛围的公示只会致使腐败更加严重,到那时民众的情绪就真的处于一个不可控的地步。更何况,党对贪腐官员这样的“妥协”真的能够换得他们对国家改革的全力支持吗?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深受腐败掣肘的中国改革何去何从?信奉“特赦”贪官论的专家学者,他们是以一种无奈的无奈情怀,希望借助暂时的威权来推动良好制度的设立,从而使得国家能够更好的迈开发展步伐,但这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好,任何改革都必须在法制的框架内,不然,只会使得中国的反腐处于一种更加窘迫的局面。(2015年04月12日观察者网温琮)



“超配”干部如何消化

2015年1月6日，中组部通报了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的最新进展：“截至目前，全国超职数配备的4万余名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中，已消化1.58万名，完成近40%。”

一年前的2014年1月，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和国家公务员局联合印发《关于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的通知》，提出了整改超配领导职数的时间表，并明确党委（党组）为消化整改的第一责任人。

同时，《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近日下发，将对县以下机关公务员设置5个职级，由低到高依次为科员级、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和正处级，在职务之外为基层公务员开辟了一条职级晋升通道。

与以往治理干部职数配备不同的是，此次整改，不仅立足于干部冗余，更是为重塑政风、执政现代化进行基础性的吏治改革。

超配是如何产生的

2014年10月底，中纪委公布中央第二轮巡视的反馈情况，其中上海、青海、河北、黑龙江、江苏和一汽集团均被点出了“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问题。上海“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有的地区和单位存在超职数配备、突击提拔、带病提拔以及领导干部退休制度执行不严等问题”；江苏“干部管理制度执行不严格，超编制、超规格配备干部比较普遍”；河北“执行职数和编制管理等规定不严格，存在安排照顾干部亲属、违规进人、档案造假等问题”。纵观十八大后的4轮中央巡视，有19个省区

市都被中央巡视组指出存在超配干部问题。

选人用人一直是巡视组关注的重点，早在2014年2月发布的巡视整改报告中，干部超职数配备问题就已经被列为普遍性问题。10个省份均存在超职数配备干部问题，而且多个省份将消化超配干部的时限安排到了2016年、2017年。中央第四巡视组对内蒙古的巡视反馈中，更是明确指出内蒙古“全区12个盟、市设有30多个巡视员、63个副巡视员，区发改委班子成员多达17人，一些旗县设有不少处科级非领导职务的问题”。

超职数配备干部不仅意味着财政支出和行政成本的增加，还改变了公务员队伍的梯形结构，行政秩序和效能由此受到影响，同时，它不仅是一个管理无序的问题，还表明权力体系的内控机制的失效。

依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领导职数“按照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确定”，确定的原则就是编制部门制定的“三定方案”。然而，“三定方案”却无法起到把关作用，历次机构改革只撤并部门，而不削减领导干部，使新部门成为干部输入地；一些地方成立临时性机构，但临时性任务结束后，“领导小组办公室”和领导职务，并没有随之撤销。

副职配备超标则进一步提供了空间。2009年中组部、中编办出台的相关规范文件，要求省级、副省级、地市级政府副秘书长职数“按不超过其同级政府领导班子副职的职数来掌握”，但“政府领

导班子副职”数量很多时候自由裁量权偏大,比如很多地方实行“1正12副”。2010年之后,中组部明确要求限制党委常委职数,市级党委常委职数一般为9至11名,县级党委常委职数一般为7至9名。地方应对的办法则是:限制副职,就提副秘书长、助理,领导职位满编,就拿巡视员、调研员“顶上”,提级缺岗,就成立更多的临时机构。

清理、反弹的恶性循环背后,是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制度困境。削减冗余便异化为重新安排位置的内部洗牌,在一个封闭性的流通体系中,“消化”只不过是权力自身的微调与重组。

运动式“消化”

最近几年来,国家层面至少进行过两次超职数配备干部的专项清理。2007年,国务院发布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规范地方机构编制管理的行政法规,规定了不得超职数、超规格配备领导成员;2009年,中组部、中编办下发了《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的通知》,要求全国两年内完成减副任务。当年,吉林省率先一次免去6名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职务,但仍有10名副秘书长在职。因此,本轮专项整顿要消化的是过去未尽的改革,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有时间限制,如何不再陷入运动式整顿的怪圈,将是一个考验。

最近,去年第二轮中央巡视的13个巡视点均晒出了巡视整改报告,被点名超配的省份也相继公布了消化的“成果”。黑龙江全省超配干部基数现为11614人,现已消化超配干部1824人,其余将于2017年12月底前全部消化;四川全省超职数配备的784名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中,已消化134名,其余的将于2016年9月底前全部消化;浙江则通报称,省政府副秘书长已减少8名,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减少87名,县(市、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减少207名;同样大幅裁撤超配干部的还有江苏,对全省超配的1146个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进行整改消化,目前已消化超职数配备

干部达55%以上。上海则明确要求违规设立的编制名称之外职务一律撤销、整改消化,目前,65家单位已全部撤销违规设置的处长助理、副总经济师等编制名称之外职务,并免去相关人员所任职务。

从各地发布的整改报告来看,对于超配干部,一般采取取消兼职、调岗、免职等方式“消化”,整治过程中也不乏一些辞官不辞薪、撤官不撤权的“假消化”现象。根据媒体报道,湖北省武穴市教育局严重超标,为消除超编现象,规定“50岁的人退二线”;郑州中牟县超职数配备干部280多名,按上级部门要求,必须在2016年底前把超职数配备的干部全部消化。为此,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约谈将各县直机关局的50岁左右的局长、书记和副局长,要求被约谈者写申请,自愿免去现职,保留职级待遇,退居二线,工资照拿。

提前退休能够腾出的指标势必有限,数据降下去并不是制度目标,清理超配背后的违规任用,才是理顺选人用人机制的关键。如何避免运动式“消化”必然造成反弹的轮回,需要进一步探索领导干部退出机制。

干部退出机制

领导干部退出的路径方式,主要是依据《公务员法》及相关法规规定。根据《公务员法》及相关规定,我国领导干部目前的退出方式主要有:退休、辞职、辞退、免职、降职、降级、撤职、开除等几种形式。上世纪90年代,领导干部退出机制就已经进入了法规层面,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出台,对公务员辞职辞退、退休分别进行了规定,并首次以法规的形式做出了“开除”公务员的规定。2006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从法律规范上确立了公务员退出机制,其中对公务员辞职、辞退等做出了更加严格、详细的规定,并首次以法律形式将“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引入公务员管理,但正常退出机制并不通畅。

从规定的操作性来看,公务员辞职的限制较多,对于一些被开除、被辞退领导干部的去向和安置问题也不明确,而且目前辞退的领导干部多是在



李光耀立遗嘱将其故居拆除 子女表示执行

人民网4月13日讯 据《联合早报》12日消息，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位于欧思礼路38号的住家将按照他生前所立下的遗嘱被拆除。李光耀的子女、遗嘱执行人李显扬和李玮玲发出声明，表示他们将执行李光耀于遗嘱中明确要拆除欧思礼路38号故居的指示。

据报道，李光耀是在2013年12月17日立下这份遗嘱，并将李显扬和李玮玲列为遗嘱执行人。李光耀在遗嘱中写道，在他过世以后，他在欧思礼路38号的住家必须即刻拆除。如果他的女儿李玮

玲选择继续住在该址，那么房子必须在李玮玲搬出后即刻拆除。

李光耀遗嘱还说，如果他的子女因法律的修改或因各种规则约束而无法拆除该房子，那么他希望除了他的子女、他们的家人及子孙以外，完全不对外开放。李显扬和李玮玲在声明中说，他们有作为遗嘱执行人的责任及作为子女的道德义务执行李光耀的遗嘱。他们也希望新加坡人民能尊重他的遗愿。

（老 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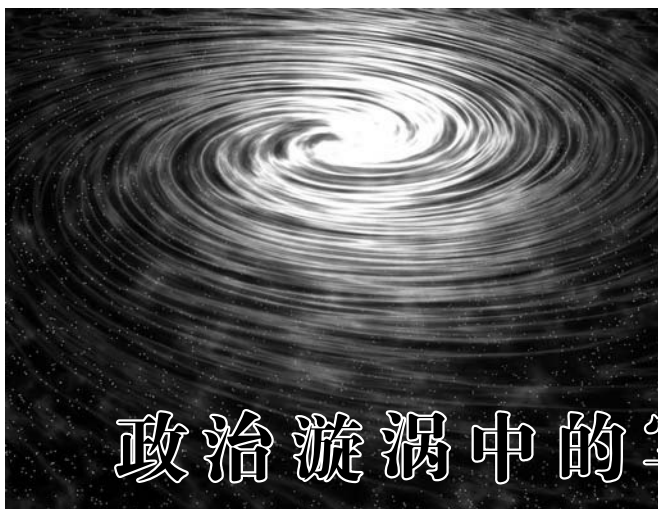
行为上有明显违规违纪的人员，对于那些不犯大错，工作能力又欠缺的领导干部却没有能够辞退的依据。有学者分析指出，组织部门在对现职领导干部进行日常调整时，对“不适宜现职”的领导干部不好界定。对那些与岗位“水土不服”的官员，尤其是对一些工作“不在状态”的“懒官”、“庸官”，组织部门很难把握让他们适时退出的“火候”与“尺度”。

而且，领导干部“问责”退出在很大还程度上存在着形式化现象。长期以来，领导干部的辞职形式主要是上级党委政府责令下级领导干部辞职，而下级领导干部自愿辞职和主动引咎辞职者并不多见。在一些重大事故或事件中，不少领导干部虽然

存在着明显不称职，甚至严重失职、渎职的问题，但他们却通过各种关系力图保位，甚至还有一些领导干部推三阻四，乱找“替罪羊”。即使是因问责而退出的干部，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另一个地方或部门“复出”。

良性退出机制的缺失增加了领导干部在有明确“兜底”的活动空间下恶性追逐权力的倾向，而主政官员在干部任用选拔上的独大则为吏治腐败提供了温床。当官职的数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之一便是增加供给。如果用人背后的附加利益不破除，选官程序不明确，超配干部可能陷入反复“消化”的怪圈。

（张墨宁 南风窗 2015-03-02）



政治漩涡中的写作班子 (三)

吴中杰

(接上期)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本来就是张春桥领导下的班子，在“文革”发动期间又协助姚文元做了许多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会受到他们的重视。此后，随着张春桥、姚文元政治地位的上升，这个写作班子也就日益显要起来。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徐景贤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下，率领写作班子集体造反，并与《支部生活》编辑部等联合成立了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接着，这个联络站联络了各路造反队伍，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从而使自己的性质也起了变化。它一方面是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同时也直接参加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当张春桥、姚文元成为上海市委和市革会一、二把手时，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徐景贤就成为第三把手，市民称他为“徐老三”——那时，王洪文等工人造反派还未蹿上来，而马天水等老干部也还未解放和结合。罗思鼎小组组长朱永嘉则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指挥，并进入市委和市革会的常委会。还有些人出任“调查组”、“农村组”和“政宣组”等组织的负责人。

但这样一来，写作班子也就没有时间再写文章了。再加上“市革会”里面各派人物的权力斗

争，这个写作班还能否继续存在，也就成了问题。不过，徐景贤深知笔杆子的作用，他不肯轻易放弃这支自己的队伍，在一一九六七年全国“革命批判”高潮中，又在宛平路华东局机关大楼内重新成立上海市大批判：写作组，同时还在康办（市委康平路办公楼）旁边的荣昌路上成立了一个专题写作组，成员都是党员，要比大批判写作组高一档。但似乎没有写出什么大文章，不久就解散了。一九六八年，毛泽东因清华大学的武斗，派遣工宣队进驻全国高校，徐景贤就趁机将写作班子的人分派到工宣队中去，借以保存这支力量。后来姚文元接管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要上海成立《红旗》组稿组，上海写作班的人马就以这个名义重新组织起来，继而又成立了新的上海市委写作组。

这个新的上海市委写作组，或者遵照张春桥、姚文元的指令，或者自觉地根据当时的形势而写了具有很强冲击力的文章，如对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的批判、对于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调查报告等，将文艺界和教育界冲得稀里哗啦。但在全国，这个写作班已不能起领先作用了。因为不久，北京就出现了“梁效”写作组——清华和北大两校联合成立的写作组。

既然写作组是权力者的工具，那么文章的威力也就不在于写作者笔力的健弱，而取决于掌握写作班子领导人的权位。上海写作班子背后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而向“梁效”发指令的却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文革”结束后清查“梁效”写作班子时，重点是清查它与江青的关系，大概为了撇清这一点，“梁效”写作组组长范达人在《“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里说：“尽管江青与‘梁效’来往不少，但是，在我看来，‘梁效’应是毛泽东通过谢静宜、迟群掌握的写作班子。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头头传达、贯彻。”同时还引用了谢静宜的谈话为证。谢说：“江青在一次会上把‘梁效’称作她的班子，我当时反驳说，这个班子是毛主席提议建立的，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的。江青听后马上改口说，那就更好了。”毛泽东是号令全国的最高统帅，大家都要跟着“最高指示”转。所以当时老百姓有句顺口溜说：“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于是“梁效”也就占尽风光了。此外还有听命于江青的文化部写作班子“初澜”等，也很霸道。

上海写作班子有一点比较特殊，它直接与上海的权力机构相结合，所以它又发展出“梁效”、“初澜”那些写作班子所没有的功能。当时各省市新成立的中共省委、市委都设有宣传部，唯独上海没有，因为写作班子就代办了宣传部的工作。“文革”后期，上海创办了文学刊物《朝霞》丛刊、《朝霞》月刊、《外国文学摘译》和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还设立了《鲁迅传》编写组（石一歌）、文学概论编写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哲学小辞典》编写组等等，都从属于写作班子，电影组虽说是由市委书记徐景贤直接领导，但也与写作班子有着联系，可见写作班子在上海权力机构中的作用。

正因为上海写作班子掌握着这样大的权力，所以新的权力斗争也就要冲着它而来。“《朝霞》事件”，就是这种斗争的表现。《朝霞》事件发生在

一九七四年四月份，其时王洪文已被毛泽东作为接班人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远远超过徐景贤，他手下的工总司（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头头们，也都一齐鸡犬飞升，窃据要津。他们在上海已掌握了党、政、财各方面大权，唯独文权不在他们手中，所以势在必夺。一九七四年三月下旬，王洪文在上海的主要代理人王秀珍到北京去和王洪文密谈之后，回到上海就提出一份要《朝霞》停刊整顿的决定书，要另两个市委书记马天水 and 徐景贤共同签字。理由是《朝霞》上发表的《初试锋芒》和“红卫战旗”有严重政治问题：污蔑民兵组织，影射攻击工总司，丑化一月革命。马天水一向主管工交，不懂文艺，而且又是结合进领导班子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腰杆子不硬，不敢拂逆造反司令的意见，自然就签字同意了。徐景贤主管文艺，自己又是作家，作品是否有问题自然不会看不出来，而且写作班子是他的嫡系，王秀珍此举要的是什么把戏他当然很清楚，只是对方来头很大，他实在顶不住压力，也只好签字表示同意。三个市委书记联合签字，事情就算定局了。这时朱永嘉为了保住写作班子这支队伍，就采取政客们惯用的丢卒保车方法，把《朝霞》负责人陈冀德抛了出去。据说，这时工总司方面已经预备好一套编辑班子和作者队伍，随时准备接管《朝霞》等刊物。（原作者：吴中杰）但后来事情有一个戏剧性变化。因为陈冀德实在接受不了眼前这个突发事变，就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萧木，汇报《朝霞》此刻的情况，悄悄跑到负责往北京送文件和稿件的机要交通站发出。萧木原来也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员，《朝霞》就是在他倡议下办起来的，此时在北京做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倒不怕得罪王洪文，他拿着信去向张春桥汇报。张春桥马上作了批示，说《朝霞》这两篇文章并没有什么错，而且他是市委第一书记，责令《朝霞》停刊整顿的事情，他怎么不知道？并明确表示，以后凡属工作中的差错，不要把责任推给下面。责任在市委，首先在他。张春桥还要

萧木马上接通朱永嘉的电话，他在电话中立即对朱永嘉下达指示。于是第二天一大早，王知常就带人将所有揭发陈冀德、批判《朝霞》的大字报统统撕下，而王秀珍则一再声明：我怎么会炮打春桥同志呢？事情终于以喜剧的形式落幕（据陈冀德《生逢其时》、燕平《我在〈朝霞〉杂志工作的回忆》）。

人们或许以为张春桥此举颇为费解：此时王洪文地位已在张春桥之上，他为什么敢于下达这样的指示？这不是冲着王洪文来的吗？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王洪文毕竟是个草包司令，在江青、毛泽东面前，张春桥还是比王洪文更受信任，王洪文过去是张春桥提拔起来的，以后也还要仰仗他的力量，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对张还有所忌惮。而张春桥之所以不顾王洪文的态度而要保存《朝霞》，倒也不是什么主持正义，而是出于政治权谋。须知张春桥是一名政客，在政客心中首先考虑的总是利益，《朝霞》事件的处理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平衡术。盖因张春桥虽然志在掌握中央权力，但上海毕竟是他的基地，他深知这个后方基地对于他在中央掌权的重要性，非要牢固地掌控在自己手中不可。而要掌控这个基地，则必须平衡各种政治力量，使他们都要依赖于自己。“文革”初期，他依靠的是写作班子，但在中国，文人是成不了什么大气候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抓住中央文革派他处理安亭事件的机遇，先斩后奏，签字同意了工总司的要求，扶植起这支工人造反队伍，王洪文等人当然要唯他的马首是瞻。后来毛泽东要求各地革委会必须结合老干部，他又拉出马天水、王少庸等人来为己所用。现在，工总司的力量无限膨胀，要想吞没一切，将来难免要失控，所以他在的一封信中将《朝霞》事件比作当年“四一二”（4月12日）红卫兵对他的炮打，就是这个道理。他不能让工总司的势力独大，而要用老干部和写作班这两支力量去平衡，否则他就难以控制了。王洪文、王秀珍之流毕竟是老大粗，暴得大权，而

不懂政治，所以才会如此肆无忌惮地扩张，犯了政治上的大忌。而徐景贤、朱永嘉虽然读过不少书，也从政多年，但毕竟是书生见识。他们想丢卒保车，而一旦丢掉这枚卒子，对方岂能得一小胜就止手乎？朱永嘉要求王秀珍不要让《朝霞》停刊，不是马上受到了王秀珍的嘲笑吗？

只是文人做到了成为别人政治棋局中的一枚棋子，却失去了独立意志，也是够可怜的了。有些人至今还以自己当年的写作是接受某领导的指示为荣，实在是很悲哀之事！

徐景贤在《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来龙去脉》中，曾说起过这个写作班子在丁香花园初建时因一桩小事而引起的大反应：“文学组和历史组原来是各管各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也没有严密的组织，领导也比较松散。有一次汤大民与上海作协文研所来的戴厚英开玩笑，称她为‘才女’，戴厚英还之以‘才子’的称号。这种调侃式的玩笑话传到《内刊》支部书记林学渊的耳朵里，他一本正经向《内刊》副主编周原冰作了汇报。一天，周原冰来到丁香花园东楼，把写作班子的人召集起来，郑重其事地告诫大家不要搞低级趣味，要做‘战士’不要做‘院士’。因为这个原因，接替石西民主管市委写作班的张春桥就和宣传部长杨永直商量，把两个组（文学组、历史组）的党员编成一个支部，以后又增加了哲学组和自然辩证法组。”

《内刊》副主编周原冰要管到写作班子的事情，是因为开初写作班子并无自己的党组织，思想工作由周原冰代管之故。但一句调侃式的玩笑话，被提到这样的高度，似乎有些反应过度之嫌。但周原冰所说的做院士还是做战士的选择，在当时却是一个原则问题。过去文人治学，讲究“沉潜反复”地钻研，对于一个学术问题，总需经过长期研究，形成独到的见解之后，才可发表意见。但这种治学方式显然不能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所以把它称为院士道路而加以否定，上峰所要的是绝对服从指令，能够冲锋陷阵的“战士”。

（待 续）